

■新作聚焦

肖亦农报告文学《毛乌素绿色传奇》

作家的责任和文学的情怀

□额·巴特尔

肖亦农的报告文学《毛乌素绿色传奇》是一部全方位反映鄂尔多斯人和毛乌素人历经艰难治沙防沙,让荒芜狂躁的毛乌素沙漠披上美丽绿装,不但在毛乌素沙漠更在鄂尔多斯高原上创造着绿色文明、科学发展和、和谐发展奇迹的大型纪实文学。可以说,这是一部现实题材的优秀作品,让我们受到了心灵的震撼和精神的升华,它在鄂尔多斯、内蒙古甚至世界治沙史上,都书写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在人类活动和攫取的欲望日益繁多、工业发展日趋繁盛的当下,环境问题已经成为一个世界性的重要问题。毛乌素沙漠曾经卷起的漫天黄沙让只顾建设不顾环境的人们梦醒和觉悟。皮之不存,毛将焉附?家园不在,其他的也都会失去。

10年前,我曾经读到鄂尔多斯作家张秉毅反映生态环境问题的报告文学《与天地共生——鄂尔多斯生态现象透析》,从中了解到鄂尔多斯在历史上是一个有着大片森林和丰茂牧草的美丽草原,曾让1500年前的大夏国建都于此,更让一代天骄成吉思汗留下“百年后可葬我于此”的圣谕。然而,千百年来,人类无休止的战争、疯狂的垦殖、过度的放牧,使这片草原逐渐失去了昔日的丰饶和绿色,成为沟壑纵横、生态环境恶劣的地方。这使我们对鄂尔多斯日益恶化的生态环境感到担忧,特别是书中以“支柱下的阴影”为题提出了对工业化下的鄂尔多斯生态环境将走向何处的疑问,让我们对鄂尔多斯未来的环境更是忧心忡忡。

10年过去了,如今的鄂尔多斯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成为全国屈指可数的富裕地区。那么它的生态环境是怎样的呢?是在这变化中更好了还是更坏了呢?这是世人极为关心的问题。肖亦农的报告文学《毛乌素绿色传奇》,以洋洋几百万字的讲述全景式地向我们展示了鄂尔多斯生态治理特别是对毛乌素沙漠治理以来这十几年来的巨大变化。在这部作品中,我们清晰的看到了鄂尔多斯人治理毛乌素沙漠的实践历程和心路历程,看到了这一桩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的壮举。从上世纪

■看小说

李洁冰《魑魅之舞》逐利冲动与精神贫血症

小说《《钟山》2011年第6期)以“我”对小娅的追寻为线索,为我们展示了“美女变巫婆”的过程。乡村风水师的女儿小娅美貌出众,有“九尾狐狸”之名。因与辈分比她高的族人相好,恰逢上世纪60年代的特殊际遇,被批斗得死去活来,而后嫁给一个鳏夫。又因婚后儿子意外死亡被公暴打,奋起反抗,在街头赤身裸体,精神几近失常。而后突然神灵附体,摇身一变,成为远近闻名的巫婆。从此,她在乡民中被奉为神人,城里的干部、老板也不时前往拜神问事。寻找小娅的过程也是小娅所牵涉的狗头官司浮出水面过程。小娅为了牟利卷入一桩高利贷,并说服妹妹将3万元养老钱投进去,结果血本无归,导致妹妹带人打上门来。传统的姐妹情深被手足相残代替了。小娅与小妹妹从关系紧张,为了帮助小娅考取民办小学教师,她设计在考试那天将有竞争力的姬娟去干活,使姬视她如仇敌。但其实她也没有得到多少实际利益,民办小学教师的身份转瞬即逝,她只好远赴深圳打工求存,同样沦入社会的最底层。姬和姊最终也因钱关系破裂。可悲的是,越是因为赚钱不易,她们越是有希望有发财的捷径;越是有希望有发财的捷径,也越容易受骗上当,由此进入了某种恶性循环。小说不仅体现了底层的精神困境,更显示了整个社会普遍性的精神空白与信仰缺失。(郑润良)

力歌《天性》天性的正反面

刘珂的儿子宝宝是一个恋乳的孩子,而这种恋乳的天性又得到了爸爸姥姥以及周围人们的宽容甚至怂恿,没有人对一个小孩子的恋乳行为给出善意的判断,因为小孩子找奶吃是天性。然而,这种天性一旦在错误的时间、错误的地点发生在错误的对象身上,就不再那么天经地义了。当宝宝在办公室当着众多男性的面,在一个未婚女子的胸前找奶吃时,他单纯的生物行为在成人那里已经演变成了一种社会行为。女同事羞愤光面,男同事脸上都泛着愠意的光,刘珂的恼羞成怒得罪了所有的男性同事,宝宝也遭受了来自孩子的天性所招致的一顿毒打。怎料刘珂却因祸得福,因为原单位工作不下去了,辞职后自己做生意,竟然顺风顺水地成了老板。刘珂源于宝宝恋乳天性的经营灵感,使他成为“宝宝的‘天性’”这一品牌乳罩的生产商和经销商。告别枯燥平庸的科员生涯,刘珂加入了成功人士的行列,与此同时,他原来的单位被撤销,从前的同事们不得不自谋生路,更彰显了刘珂及早离开的光荣。力歌这篇《天性》(《长江文艺》2011年第12期),表面上看是写宝宝的的天性和由这天性给父亲带来的人生起伏,但其实是在借孩子纯真无邪的天性来揭示成人世界的龌龊和邪恶,为我们展示了天性的正反面。(韩春燕)

五六十年代开始,鄂尔多斯人便开始向毛乌素沙漠发起了挑战,开始了对毛乌素沙漠的治理,但是,这个过程是漫长而艰辛的,治沙的队伍由小而大,保护环境、治理沙漠的理念在生产生活的实践中逐步清晰和坚定。治沙行动由民间到官方,由自发到有组织,由无序到形成规章,由沙进人退的被动逐步变为人工进沙退的主动,最后达到封沙固沙,还毛乌素沙漠一片绿色。如今,鄂尔多斯的经济建设和环境保护的信念已在广大人民和各级政府建设家园的蓝图上和心底里坚不可摧,鄂尔多斯人知道,不但要做到经济繁荣、生产发展、人民富裕,更要做到家园美丽、环境宜人、安居乐业。

肖亦农是鄂尔多斯人,是鄂尔多斯热土养育的作家。他在鄂尔多斯生活了几十年,青春年华和人生经历都和这里的山水草木、世事变迁息息相关,因此,他对鄂尔多斯不但有着深厚的情感,更有着一个本土作家对家乡的殷切期望和深切责任。在他听到了毛乌素沙漠的变化后,用了近三年的时间,跑遍了毛乌素的沙地、沙梁,深入到种草植树的毛乌素人的驻地和治沙现场,进行了大量且长时间的实地考察和实地采访,因此,他的这部作品不但饱含着他采访和写作的辛劳和汗水,更饱含着他对家乡的一腔深情和他以文学展示家乡巨变的情怀。这是一部真实不虚,具有很强说服力的力作。我们常说,文学要反映时代的变化和要求,文学要讴歌社会的变迁和进步,文学要贴近生活、贴近群众、贴近时代,然而,这些年来,虚构的、荒诞的、无聊的、尖酸刻薄的写作很多,很难看到一种高远而宽大、带着温暖和希望的写作,这是由作家的心灵视野决定的。肖亦农的写作让我们看到了生活的美好、心灵的高尚、前景的光明,让我们从文学中读到了温暖和希望,读到了精神和追求,读到了激情和力量。

这部作品带给我们的启示,不仅仅是毛乌素人治理沙漠、并让沙漠披上绿装的成功经验,更重要的是向我们展示了一个地区之所以成功发展的理念,即人类进入工业时代以来,在生产力得到极大解放,社会财富

得到极大丰富的同时,如何在发展中达到与环境的和谐,如何做到不以牺牲环境为代价,既做到经济大发展,又做到家园更美丽。经济发达国家是在实现工业化之后日益认识到环境污染对于发展成果的巨大抵消作用,而发展中国家则在工业化目标努力的过程中便面临着如何实现工业化、经济增长与环境之间的协调问题。如何处理好二者的关系,搞好环境保护工作,成为经济能否持续增长的关键。这是一个国家和地区在工业发展进程中面临的一个无法回避的尖锐问题。发展经济与保护生态环境的关系成为人类文明发展必须认真思考和解决的问题。鄂尔多斯地处西部,从长远发展来看,要促进经济的全面发展,还必须加快工业化的进程,大力发展特色产业,特别是一些具有优势的加工制造业,积极推进工业结构的调整,才是一条持续发展、科学发展的道路。鄂尔多斯人在发展的实践中成功解决了这个问题,正如报告文学中指出的那样:让工业化思维进入生态领域,生态领域才会产生质的革命。现在,毛乌审人、鄂尔多斯人将循环工业引进了毛乌素沙漠,用工业化带动生态建设的产业化,做到了经济发展、家园美丽、人民幸福,正在书写着沙漠进入现代化的篇章,这正是绿色乌审给我们的具有时代意义的重要启示。

这部报告文学不仅仅是一部鄂尔多斯人的治沙史,也是一部鄂尔多斯的文化史。我们能在这部作品里感受到这片土地丰厚的文化积淀。作者从距今7万年前那颗萨拉乌苏牙开始,引领我们穿越时空,尽览了鄂尔多斯远古的丰饶和文明。那些生态环境和人文历史的过往变迁,让我们对这片土地充满了敬意,让这片沙漠、这片土地因文化而生动,文化正。正是那些历史名人、民族精英和丰富的文化现象,让这片土地充满了生机,有了生命的凝重。作品对鄂尔多斯历史文化、人文变迁的回顾,加重了本身的纵深感 and 厚重感,让我们从根本上理解了鄂尔多斯人顽强坚韧的持续治沙环保的信念和在沙漠中创造绿色传奇的精神根源。

■第一感受

为检察官的“平凡世界”叹与歌

□周梅森

照。尤为可贵的是,作者把写作的圆心锁定在一个叫林梅的女检察官身上。这个秉性善良、内心充满理想主义的女人,在生活中却屡遭重创,最终身患癌症,凄然离世。她的一生,如用现实的标准衡量,可以说是极不成功的一生,她的命运在洪流奔涌的检察官业中更加一粒微不足道的水珠,但作者用巨大的篇幅和饱含深情的笔触,歌颂了这位平凡而又闪耀着人性光辉的女性。这个平凡人对理想的执著、对爱情的忠诚、对生活的坚强,构成了整部作品的灵魂,也使这部作品具有了不同寻常的高度和深度。

这也一个真实的世界。这个世上原本就不存在真空,检察机关也不例外。在小说主人公活动的主要天地——安平县检察院,时常有一些灰色现象发生,但没有丑恶能衬托出美,没有阴暗能映照出阳光,没有曲折又回来成功的欢愉?当我读到安平检察院院长除害群之马投下的阴影,卧薪尝胆,逆境奋起,最终迎来事业兴旺这一节时,禁不住慨然长叹:成功容易却艰辛!

检察官小说当然离不开重大案件的

支撑。这部作品中出现的“捉瞎子”致在押人员死亡、涉及金额过亿的“地下钱庄”等几起案件,均源于真实。作者长期的检察工作经历使她在掌握素材方面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很多案件细节让我读后大为过瘾。真实而艺术地再现现实生活,体现出了作者的气宇与智慧。

这又是一个温暖的世界。检察题材是沉重的,但我读了梅静的这部小说,非但没有丝毫压抑之感,反而有一股暖流在心头缓缓荡漾。梅静的文字是温暖的,她用文字营造了一个温暖的世界。女主人公林梅与丈夫马新民之间相濡以沫的挚爱情、检察官伸正义与女儿仲秋之间亲密绵长的父女之情,“小妹”袁雪与丈夫彭至诚分离20年却持久不变的相思之情,流淌于作品的始终。在她的作品中,检察官一改不苟言笑、冷面如霜的传统形象,被还原为一个个有血有肉、有情有爱的活生生的,人们印象中生硬刻板的检察工作也因有了这些血肉丰满的人,而变得温情脉脉起来。

5位主人公的命运带有浓烈的悲剧色彩。在故事的最后,当生者无限伤感地追忆逝者时,作者引用林梅生前的一句话“无论生活用什么表情对待我们,我们一定要用笑容去面对它”,并就此戛然而止,为作品画上了一个回味无穷的句号。这句话是整部作品的点睛之笔,它让读者在掩卷叹息之余,心中重又燃起希望。

文字是思想的外在表现,我相信,只有内心足够温暖的人,才能写出如此温暖的文字。

■对话

从《赤色小子》《永远的哨兵》《可爱的中国》《少年方志敏》出发,写出一些名堂来的张品成似乎一直被贴着“红色题材”的标签。不过这也难免,单看他之后创作的《红刀》《红药》以及正在创作的《红币》,都是以红军为叙述对象,难怪许多读者觉得张品成就是写“革命历史题材”的。实际上,他的确是一个有红军情结的作家,而这种情感绝不止于拥戴、歌颂,而多了几分反思与理性的意识,正如《红药》扉页上印的那句话,他是“怀着爱,怀着敬意,书写那段永远也不该忘却的历史”,用作家本人的话来说,“我写红军历史是要启迪人们思考当下”。

李晓晨:小说书名叫《红药》,“药”在小说里也是一个特别重要的道具和线索,“药”究竟意味着什么?

张品成:在《红药》这本书里,“药”的确是一个很重要的词语,它是贯穿始终的线索,小讲说的就是各种人寻找药物、重建医院、救治伤员的故事。不过,“药”又不是这么简单,它有更深层次的象征意义,就像有专家评论的那样“是有寓言意味的”。从中国现代文学史来梳理,我们会发现,“药”是许多文学作品都关注的一个点,包括鲁迅在内的很多作家都写到这类题材。《红药》其实也接续了这样一种思考——如何才能解决当下社会中的一些问题,尤其是人心方面的问题,小说给出了自己的回答,那就是各种思想和谐相处才能解决问题,社会的和谐需要思想、信仰的和谐。

李晓晨:小说以一场战役中被炸毁的前锋医院为环境铺开故事,写战争却避开了直接描写战争场面,这是出于何种考虑?

张品成:之所以选择医院作为典型环境,是因为医院是一个相对封闭的环境,比较容易构思,几个人物发生在医院的故事比较好驾驭。许多人说开头就在医院中提出“谁是内鬼”的问题很像一部悬疑小说,也有点类似影视剧剧本的写法,但如果你读完了就会发现我的小说写得根本不是悬疑故事,而是借了这么一个引子讨论更深层次的话题——人心的话题。

至于没有写战场,这是我一直在创作中坚持的,我很少会直接描写战争的惨烈,我自觉远离了许多所谓的“革命历史题材”的创作路数,不写战役,不一味渲染战争的惨烈和残酷。这些年我一直写这类题材,是觉得有必要客观地呈现红军历史,提醒读者不要忘记我们民族曾经经历过的这一段岁月。这也可以说是“革命历史题材”的一种边缘化创作吧。

李晓晨:那是为了边缘化而边缘化吗?

张品成:是为了保持清醒而边缘化。《红药》体现了一种客观、理性的思考,无论是情节、人物还是语言、环境都没有太多煽情的成分,就是很冷静、平和地在讲这个�故事——怎么重建医院,到底谁是叛徒?读者可以自己进行思考,得出结论。尽管我最终歌颂了革命英雄主义精神,但我不是为了歌颂而歌颂,这会更符合逻辑并更有说服力。

李晓晨:小说里的人物,齐满年、刘锡吾、诸葛述泰、戴尔东、白长吉等都代表着不同的信仰,他们在战争中聚集到一起最终都认同了红军的价值观,这种设计会不会戏剧性太强、设计感太强?

张品成:在战争年代,信仰是一种非常强大的力量,如今也该是如此。我觉得,只有各种信仰的人和谐相处,这个社会才能实现真正的和谐。小说里的人物分别代表着共产主义、三民主义、儒道文化等,他们在治病救人的人类普世价值的召唤下达成一致,为一个共同的目标而努力,同时本人也在这个过程中得到升华。

李晓晨:齐满年这个人很复杂,他作为一名红军干部忠诚于共产主义信仰,但又偏执地认为一定有内鬼才导致医院被炸,当他最终发现压根儿就没有内鬼时内心完全崩溃,选择了自杀。为何树立这么一个人物?

张品成:之前我重走了红军当年走过的很多地方,类似的人和事其实很多,这才是符合历史真实的红军——所有人都不是完美的,红军也经历了一个由青涩到成熟的过程。齐满年就是这些人中的一个典型,他的个性的确很复杂,有评论家说他是革命历史题材文学作品中一个全新的、具有颠覆性的人物,但我也知道这个人物的塑造也有问题,毕竟是一个新的形象,写起来可能没那么驾轻就熟。

李晓晨:小说中女性人物很少,似乎只有两个,凌信琪给我留下了比较深的印象,开头她在河边洗脚带的场景能引起许多遐想,但中间这个人就没动静了,到后半部分她疯狂地爱上齐满年,在齐满年死后齐的仇恨又移植到她心中。女性在小说中好像力量比较薄弱吧。

张品成:没错,凌信琪其实是我很想写的一个人物,想让她立得住,但塑造得还是不够好。与其说她爱齐满年,不如说她特别敬佩有信仰的人,哪怕这种信仰是错误的、偏执的。我不太擅长塑造女性人物,尤其是上世纪三四十年代的青年女性,就更不太了解。如果你看我的儿童文学作品,会发现里面几乎没有一个女孩儿角色。因为害怕驾驭不好,所以写得就比较少,在这方面我还是比较诚实的。

李晓晨:这个故事读完让人感觉有一抹悲剧色彩,战争是胜利了,但从另一个角度来说,任何一场战争都是对人性的严重扭曲和变形,小说里每一个人似乎都面对了这种扭曲。

张品成:我不否认这一点,小说虽然有悲剧色彩,但最终要表达的是一种积极、阳光的力量,哪怕死了也死得其所、重如泰山。即使齐满年最终选择了自杀,但包括他的反对者和敌人都认为他其实得到了一个很好的归宿,所有人都觉得他死得其所。

李晓晨:这么多年,一直咬着红军不放手,写了许许多多似题材的作品,在你的创作中什么是一以贯之的?

张品成:首先,我写红军也好,写战争也好,都是为了启发人们思考当下,小说必须要有当代性,有现实意义。整个红军的历史其实彰显的就是一种平民精神。红军之所以受到那么多拥护,是因为他代表的是普通百姓的诉求,是那些农民、工人、小市民们的诉求,而这一点是无论到何时都该坚持的。其次,我觉得历史题材小说必须要遵循历史的真实,客观反映历史,作家不该一味迎合某种趣味。

李晓晨:那你认为自己的小说是一种类型化创作吗?

张品成:怎么可能,思考是我一直的坚持,思考让我的小说不会陷入类型化创作的窠臼。

写红军历史是为了思考当下

□张品成 李晓晨